



怀念於梨华：

梦回庐山 又见梨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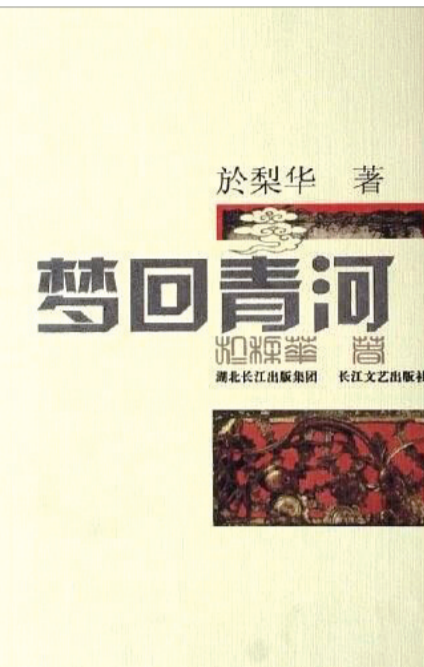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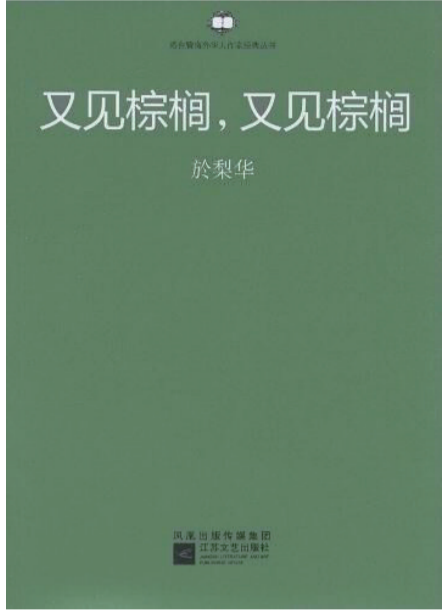
□公仲

於梨华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生命力如此顽强，她积极、开朗，她爱好运动，热心待人，虽已89岁，可对于她，还年轻着呢！据玲瑶小妹妹说，她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间受到家里保姆的感染，真太令人痛心！近些日子，网上信息爆棚，海内外华人文坛都在悼念着於梨华。於梨华生前身后，魅力不减。我看，至少有两缘：一是她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文学成就；二是她可贵的人格公信力和人性的亲和力。

於梨华已经走进了历史。其实，历史也已经给了她客观公正的评价：“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开创者、第一人”，“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夏志清称她是“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最有毅力、潜心求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诵读的作品的，我知道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白先勇说，“在全面描绘中国知识分子旅美生活方面，没有台湾作家比得上於梨华。”她写作勤奋，佳作极丰，可谓“写尽天下悲欢离合”。其创作内容主要是描写大陆与台湾生活和留学生生活两方面。她从《梦回清河》到《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再到《傅家的儿女们》等，显示了她从无根的一代走向了觉醒的一代的历程，奠定了她在华文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她的人格公信力和人性的亲和力，同样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和赞赏。她挚爱自己的故国故土和家乡的人民，她说：“我是海外学人之一，也是作家，更是‘虽然住在美国，实在关心中国’的爱国者。”她是最早一批留美作家回国访问的，1975年她飞回上海，即去到她曾经就读过的镇海中学看望师生，还在当年她家的老屋前流连忘返。回美国后，她一心想为故乡为同胞做些什么。她执意将正在美国名校读书的女儿送去北京插班入学，她认为自己的后代必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她兼任了纽约州立大学国际交流处主任，费尽心血，

建立了与中国五所大学友好交流关系，每年接收15名大陆学者来美进修。这是当年最早最大的中美大学交流项目。对于学业和事业，她有一种虔诚的敬业精神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韧性。她说：“人生的许多滋味都尝过了。唯一可以相告的，你能为我高兴的：是我并不颓丧，不认挫败，保持韧性。”她在台湾大学外语系学习时，老师说她外语基础差，强令转到历史系去。可她奋发学习，最后竟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加州大学录取。在加大，她用英文写作的《扬子江头几多愁》，获得了米高梅奖第一名，击败了那些用自己母语英文写作的白人学生。当然，她从事文学创作事业也有不顺的时候，她说：“瓶颈现象时常有，有时少不得停顿一阵，不写不想，把那扇门关闭起来。同时多看书，有机会旅行绝对不放过。”《文汇报》评价她“决不被动而完全是打主动仗的，有一副冲锋的勇气”。现在，她以自己丰厚不朽的文学著作，充满爱心、正直、善良的人生行状，为自己生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人们都敬重她，怀念她！



令我难忘的是上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夏之交，我们陪於梨华的庐山之行。1999年，我们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合作编写了一套五卷本的《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丛书。其中当然少不了有於梨华传。这样，我们就与她有了多次反复的联系。在一次通话闲聊中，她透露说，她几乎走遍了全球的山名峻岭，可就是没来过庐山。这话我记在了心上，即与学校、出版社、报社、电视台商谈，大家一致共同邀请她来访，到庐山一游。我们也借此机会，请她来给学生做个讲座，我们的华文文学课有她一个章节呢。

也是天公作美，那几天南昌、庐山都是晴天多云。当天下午5时，我们赶到机场，飞机正点到达。先出来的就是於梨华。她短衣长裤，娇小身材，矫健身段。身后是她丈夫奥立文，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的校长，他是位残疾人，右腿像是假肢，用两个手杖助步，相当吃力。旁边有一位小伙子帮忙，将他扶上轮椅。那小伙子是复旦大学外事处的，是奥立文的硕士生，叫陈寅章，是专程陪他们来的。我们顺利上车，直奔青山湖的五湖大酒店。一路上，

於梨华左顾右盼，问东问西，说说笑笑，十分活跃爽朗。到五湖，於梨华夫妇安排在1316套房，朝东南。於梨华拉开窗帘，见四周水光粼粼，天水一色，顿时跳跃起来，叫道：“快看呀！我们在水中央，真好看哪！”她天真单纯得像个小孩呢。

次晨，我们近9时动身。一路上，主要由我来介绍庐山的历史变迁、人文景观，也有些传说趣事。於梨华听得很感兴趣，时不时还喜欢刨根问底。我基本上还经得起这场“考试”，因我至少上山不下20次，还参与编写过几本有关庐山历史和文学的书籍。谈笑间，很快就上山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直登东面含鄱口。因日照关系，看庐山一般是早看东，下午看西。所谓含鄱口，就是说这山口看去像是含了一个鄱阳湖，山含着水，风景特别美丽壮观。於梨华像是着了魔似的，飞奔下来，朝含鄱口大牌楼跑去。於梨华从大牌楼往上登去，前面有三个观景亭，一般人只上到第二亭就止步，但她坚持要走完三个亭子，纵览含鄱口全景，从五老峰直到山下的将军村。记者们要跟上她的确还蛮费劲的。之后，又去看了庐山国家植物园。

饭后稍事休息，就又出发去参观庐山大厦、庐山博物馆以及庐山大礼堂。这些都是民国时期老建筑群，时间有限，只能走马观花，一带而过。之后去看了庐山人工湖旁的芦林一号别墅，号称毛主席故居。其实主席基本上没在那里住过，不过是照他的居住习惯而设计建造的。院子不小，一色平房，卫生间特大，有书架，可读书。看后，就来到“美庐”参观。那是当年一个英国人送给蒋介石、宋美龄的别墅。在院子南面树林中，有一块天然巨石，上刻有“美庐”的字样，据说是宋美龄亲自题写的。现在这里门牌叫河东路180号。它是唯一的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住过的豪宅。它有三个敞开式外廊，一个大平台，一楼南头还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阳台。主体是两层，上下格局一样，都有大客厅、大卧室，宽大的门，以落地玻璃和木格几何图案装饰，显得高贵阔绰。更因为政治原因，“把这幢小楼推上了迷雾而又显赫的境地”。人们还特别欣赏它的绿门、绿窗、绿廊、绿栏、绿柱，而那灰褐色石墙，也因爬山虎的缠绕成了绿墙。它承载了百年历史风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了庐山的旅游景点对外开放。这个美庐，现在还陈列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和资料，供参观者阅览。於梨华来到这里，既对这里的小楼风景颇为赞赏，更被那些难得的历

史文物资料所倾倒。她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去了，直到人们提醒她，下面还有电视台的采访呢，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嘴上还叨念着“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第三天清晨，晴空万里。我们清晨5点就都起来了。大家在院子里大树草坪四周围绕，吸收新鲜空气，欣赏大自然美景。小车送我们到花径下车，往后就靠自己两条腿了。於梨华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吟诵白居易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郑重地向她宣告：前面锦绣谷是非常陡峭的下坡路，全是石头台阶，打滑，很危险，还要走上近一小时才能到仙人洞。要考虑自己身体条件，不能勉强逞能，最好还是坐车直接下到仙人洞吧。可她毫不动摇，坚持要自己走下去。我们无可奈何，只有陪同她慢慢走下去。当我们走过天桥，转向南面，前面豁然开朗，一望千里。於梨华忽然情不自禁大叫一声：“哇！太漂亮了！”在阳光的照耀下，宽广无垠的绿色大地闪着金光，远处是茫茫的长江，近处是绿荫红墙的东林寺，四周稻浪滚滚，炊烟袅袅。於梨华看得如痴如醉，说：“生平走过千山万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绝伦的风景。不枉此生！”於梨华个小身轻，登的比我们快，不久就到了大天池。古池已经干涸，倒是龙首崖引起了於梨华的关注。我说那龙首崖就不必去了，上下500多台阶，约有25层楼高，而且更陡峭难爬，也没有太多看头，只是像个龙头而已。还号称舍身崖，下面是万丈深渊，不少人就在那里失足舍身呢！於梨华一听后面说的舍身崖，就来劲了，一定要下去看看究竟。她就是这么任性，我们只能依了她。好不容易下到龙首崖，大家都气喘吁吁，可她不当回事，立即就往龙头走去，我们慌忙叫住她：“危险呀！别往前走呀！”可她倒像慷慨就义，大无畏地一步一步迈向龙头顶端，还将一只脚伸到外面，两眼向下张望，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我们吓得都不敢出声，不敢睁眼，屏住呼吸，祈求老天爷保佑啊。而她看够了后，转过身，从容地从退了回来，说：“这里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於梨华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们已经永难忘怀。

匆匆四天时间，紧张、热烈、坦诚、友爱。直到今日，当年於梨华的音容笑貌，个性风采，时不时地仍在我眼前闪现，我真想梦回庐山，又见梨华呀！

边缘语境下的情绪构建一直以来都是作家们在自我审视时所强调的核心命题，黑孩在新作《惠比寿花园广场》中通过镜像书写下的人格弥合，完成了某种颇具自传性质的背离化书写。也正是在这种暗示意味的主观性叙事之下，作者完成了对内心宇宙和外部世界的双重探知，从而触及到了世俗视角下的繁复现实，探讨了未知之域中的生命反思。

小说所叙述的情节并不复杂，在飞机上认识的朝鲜族人韩子焯意外闯进了“我”的生活，而当“我”知道能够入住惠比寿时，又匆忙坠入了和韩子焯的爱河。然而很快，朝夕相处的同居生活昭示出韩子焯是一个偏激、平庸甚至招摇撞骗的无耻混蛋，生活已经漏风漏雨，他却还要伪装成富丽堂皇的精英模样，而最可怕的是，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愿意离开男友，不愿放弃对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憧憬。而故事的最后，“我”终于决心搬离惠比寿，并且最终拥有了崭新的人生。

就黑孩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写作经历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自传性质的小说。她借用外部世界的人性扭曲来观照自我内心宇宙的阴暗面属性，又在自我感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向着外部世界中的边缘困境提出质疑。正是在这种自我失落的理性叙事中，作者完成了一次繁复现实下的抽离。

自传性质的虚拟与背离

在小说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与汪曾祺先生的情谊：犹豫是否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赶上我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我去汪曾祺的家里拜托汪曾祺给我写序。没想到那一次见面成了最后。汪曾祺在序言的结尾处说：“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这样一些具有明显的现实属性的情节带入到小说中之后，很显然，读者会产生某种云山雾罩之感：小说中的“黑孩”到底是不是这个作者“黑孩”，二者的身份重叠又究竟在何处？

另一个具有真实性质的人物则是小说中的“妈妈”，显然，如果说作者在小说中对于“我”的真实性把控是五分之一，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小说中的“妈妈”就是作者对母亲的再现。小说中直观地流露了太多的“我”对妈妈的情感，这些文字读来干净而温和，我们甚至能在其中感受到近乎散文般真切盈动的情绪。这种情绪或许都不仅仅是一个女儿对于母亲的依恋，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复杂人性在失真状态下对平常人世间极力靠拢的本能。

对“我”而言，惠比寿花园广场是繁复都市下的现实意象，代表着我对现实存在的欲求；而“妈妈”则代表着完全的精神牵引，在一种特定的情绪构建中寻求出具体的共鸣。当“妈妈”到达惠比寿花园，又在“我”和韩子焯的故事之间扮演了引导者和解说者的身份之后，小说构建出了一种具体又虚拟的真实特性，在一个合乎逻辑的时间轴上形成了某种叙事观感上

未知之域的精神反思

——评《惠比寿花园广场》

□冯社文



的意识扭曲。在这种真实触感的自传书写之下，韩子焯这一人物就显得尤为背离。在小说中，我们能够隐约地感受到，韩子焯这一人物实际是有着强烈的不真实性的。他从韩国偷渡到日本，然后在他的叙述中，自己借着100个教授的推荐，拿到了永久居住资格，而后，他又对那个他几乎从未回去过的朝鲜有着深刻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情结。与此同时，他又是虚伪的、无耻的。他计较着“我”的稿费，甚至阴险地要把“我”的护照和存折收归管理，而到故事的最后“我”才从房东口中知道，原来一直以来，这是个赖居在惠比寿的无耻混蛋。

和小说近乎自传般真实感明确的背景不同，韩子焯的身上带有一种极为奇幻的戏剧色彩。在他的身上糅合了病态人格和精神隐喻，甚至有一点政治属性的色彩。而从他出现自我介绍开始，他的这种诡秘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意象予以暗示：“韩子焯说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从韩国跑出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如今长大成人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但是，说自己是朝鲜族人，因为日本也有好多同类。”

而“我”与韩子焯之间的情绪博弈和欲望纠葛，巧妙地在现实背景下拓展出了虚拟的背离空间，“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韩子焯的丑陋和不堪，然而最可怕的是，“我”无法拒绝这种丑陋，甚至抱着继续在惠比寿花园广场生活下去的微妙幻想，在殊异的氛围之中自我沉沦。

镜像人格之下的互相弥合

小说中的韩子焯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丑陋虚伪的人性，他与“我”相互折磨，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一团糟。

最开始他和“我”认识时，他所展现的是一个聪明过人又坚强隐忍的形象，虽然是朝鲜偷渡而来，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永久居住的权利，甚至能够携“我”入住惠比寿花园广

场。面对着每个月高达19万多的房租，他更是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自己交房租，而让“我”负担生活开支。在这样的攻势之下，即便“我”在生活开支这方面也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但怀着对惠比寿花园的向往，“我”仍然同意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贪婪和阴狠很快地显示出来。他知道“我”作为作家，会有一大笔稿费。他精心地算计着这一切，甚至不惜偷去“我”的存折和护照。小说进行到这里，韩子焯恬不知耻的本质彰显得淋漓尽致，而“我”的无力乃至至于愤怒也显得格外挣扎和激烈。

随着故事的发展，关于韩子焯更多的秘密被血淋淋地揭开了。他从未给吉田太太交过房租，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在各国奔走的生意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四处游荡的骗子，是一个在不堪的生活中夹缝求生的蛀虫。

事实上，韩子焯与“我”之间的关系不能不令人想到目前社会上被热烈探讨的“pua”事件，尤其在“我”对母亲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仍然难以自拔，更令读者感受到可怖的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韩子焯是在自己的扭曲人格中完成了对“我”的精神控制，他抓住了“我”性格中的弱点，包围了“我”的情感表象，甚至不断地对“我”施加压力以期达到他所能控制的程度。在这样诱导和摧残双重的压力下，“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从这里开始，我们能够感受到小说中“我”已然陷入了一个被操控的魔咒中，她明明了解韩子焯的一切劣根性，同时也为自我的软弱所愤怒，但与此同时她仍然对韩子焯抱有幻想，甚至试图帮助韩子焯改变，以完成一种情绪上的弥合。

所谓爱情，所谓共同生活，原来并不是真挚而不掺杂质的，韩子焯固然可恶，固然算计着“我”的一分一毫，但作为“我”而言，又何尝不是在这种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试图推敲到物质的本源。

“我”和韩子焯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斥人格，镜像化的对照书写之下，反倒是这种最原始的对于生命欲望的渴求

更能凸显出人性在当前的失落。而在时代的发展动因之下，作者也观照到了人性在当下的低微与软弱，女性并非没有能量，男性也并非绝对的占据主导权，但在这种绝对的精神控制乃至摧残之下，“我”有时候就如同那只被施舍的流浪猫，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期待着一丝施舍的温暖，甚至会在真正的温暖到来之时，感到本能的恐慌与逃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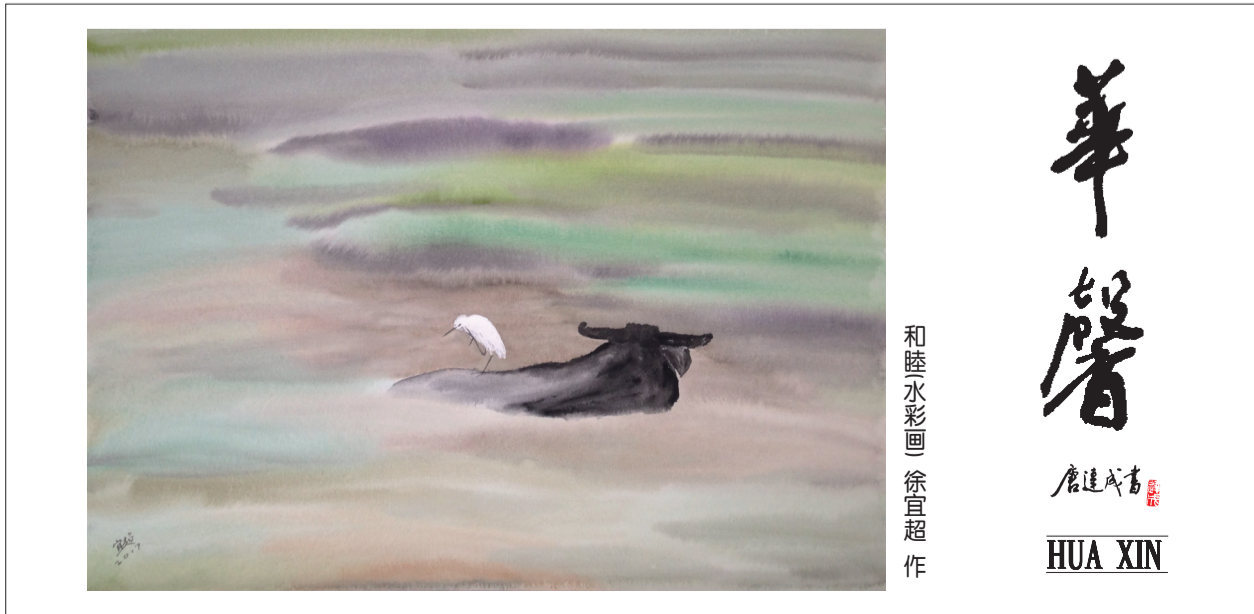
未知之域的沉重反思

无论是“我”还是韩子焯，都可以算是一个现代理性驱使之下逃离了自我精神原乡的放逐者，小说绝不仅限于简单的社会批判，而是制造出了边缘困境之下的极不稳定的生存空间，去表达未知之域下的自我越轨。作者深刻地把握了叙述上的分寸，借由“我”和韩子焯之间互相博弈的较量乃至于缠绵的自我堕落，恢复了虚拟无序之下的某种沉默的力量。

小说的另一个反思要素源自于不断出现的关于“我”的作家身份以及诸多真实语境的书写。前面我们提到过，小说进行的是一种颇具自传性质的书写，因此，我们很容易地就能将作者本人的身份与小说中“我”的感官体验联结到一起，从而获得潜在的意蕴想象。

作为一名长期定居日本的女作家，黑孩所尝试的是一种极为原始性的经验写作。诚然，她可以选择更为系统化地对未知的他乡进行一个意义化的书写，但就其自身而言，她或许更愿意将视角落于生活，试图去实现作家对于人间的深刻凝视。这在文学角度而言，其核心价值就是具有社会自觉性的作家们所坚守的勇气与创新。

随着时代的进步，物欲繁荣逐渐成为文学中持续存在的写实性背景，《惠比寿花园广场》实际展现的是一个自我审判的作家正在如何与这种未知语境下的世界进行对抗。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被无限模糊，现有世界的已知性反而成就了某种人性中的寓言化书写，从而在日常的无常中描摹了一种未知形态下的跳跃性真实。



和陸水彩画 徐宜超作

華馨 唐建奇 HUA XIN